

# 生活转折与创作转型

## ——试论皮日休创作差异形成的原因

彭庭松

(浙江大学中文系,浙江杭州,310028)

**摘要:**皮日休前后期作品在内容、体裁、风格乃至成就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其创作表现为一个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创作者的人生经历尤其是生活转折密切相关。皮日休生活转折带来政治热情的消长以及性格气质的变化,创作主体心态与此遥相呼应,互为表里。两者的互动关系,正是前后期创作差异形成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皮日休;生活转折;创作转型;政治热情;性格气质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5-0691-04

咸通八年(公元867年),皮日休中进士,其创作即以此为界判然两分。前期以《文薮》为代表,行文“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sup>[1]</sup>。虽为行卷之作,但文气磅礴贯通,文意无适不可,了无摧眉折腰之卑格,时有“锋芒”和“光辉”交相映发<sup>[2]</sup>。后期作品大多集中于《松陵集》,在这部酬唱诗集中,皮氏笔底面对的是内敛的题材,歌喉吟咏的是闲适而又略带感伤的调子;文字上追求清新流丽和奥博险涩两种风格。但遗憾的是,其艺术成就不大。主要的失误在于:笔墨雕琢过甚,意境浅弱卑狭,风骨、气象杳不可寻。

大凡作家前后期风格总会出现一些变化,这原本无足为奇。但像晚唐皮日休那样迥然有异,简直判若两人,毕竟令人惊诧。这个中现象乃至现象的背后值得探究。论及创作特征形成之原因,当然免不了见仁见智。窃以为皮氏前后差异的形成,从文学本身发展视之,未尝不是追求“新变”的结果。然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创作总首先表现为主体精神的阐扬,其次才是文学技巧的运用。前者是“本”,后者为“末”,固不可颠倒。是以笔者思考的中心在于,究竟皮氏前后主体精神有何不同,又是如何形诸笔墨的,藉此重点揭示这种变化得以发生的关键所在。

### 一、政治热情的消长与创作旨趣的分野

就人生角色而言,前期的皮日休是汲汲于功利的文士,后期则是远眺江湖的隐者。角色的转变与生活经历特别是人生重大转折息息相关。这种跃变自然与创作主体互为表里,同创作的转型彼此呼应。就创作主体一方来说,转型之关键表现为政治热情的消长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波澜起伏,创作旨趣亦呈现出阶段特点,最终导致前后期的分野。

前期皮日休在人生道路上迈出的两步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与安分守己做农民的想法诀别,携书隐居鹿门,完成了向文士角色的转变;二是走出书斋,“绕者二万里”<sup>[1](附录1)]</sup>的壮游,深刻地改变了他的精神风貌。政治热情在人生的转折中不断得到激荡鼓舞,成为他创作活动中最为强劲的驱动力。

鹿门五年苦读,皮日休自感“试艺称精专”<sup>[1](附录1)]</sup>,于是压抑已久的自卑阴影一扫而光,代之以“立大功,至大化,振大名”<sup>[1](皮子世录)]</sup>的强烈自信。角色的大转变带来了主体精神的脱胎换骨,书斋中他与圣贤之道心领神会,意气和热血在胸中风云翻滚,逐渐升华为不可阻遏的政治热情。他俨然以光大韩愈道学为己任,试图重振衰弱已久的儒家纲纪。“是敢驱颓波,归之于大川”<sup>[1](附录1)]</sup>,雄心

英气,吐露声口,表现出舍我其谁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此时他对社会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看法,并渴望在实践中一展襟抱。

皮日休壮游的主要目的是干谒公侯,求取功名。但凡“所至州县山川,未尝不求其风谣,以颂以文”<sup>[11](崔山赋序)]</sup>,可见其中也包含有借山水壮情怀、览风土察民情的意图。与他富有青春气息的精神相比,晚唐的政治现实却是暮气沉沉。抚今追昔,皮氏对盛唐风光羡慕不已。李白、孟浩然等景仰的人物都有过类似举动,他未免没有效仿的成份在内。皮氏向风慕义之举具有天真、理想的色彩,不仅壮游是追寻旧梦、扩张心胸的激情投射,而且,他亦梦想着以布衣之身干谒天子,一鸣惊人。懿宗即位之初,宣称:“诸色人若上封事极言时政得失……任自投匭进状,当必亲览”(《全唐文》卷八五),大概是受这道诏书的激励,皮日休向政府上书两通,即《请孟子为学科书》和《韩文公配享太学书》,表达自己踵武韩愈复兴儒学的决心。然而此次政治实践并未获得积极的回应。皇帝的求言诏只是一个姿态而已,人们反见的是言者有罪,动辄得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揭露的真相是,上书者“或鞭撻于市朝,囚禁园苑,深埋沟壑者,不计其数”(《全唐文》卷八零四)。虽然皮氏幸免于祸,但现实终究朝热望泼了一盆冷水。随着游历的深入,所见所闻总是触目惊心,他那颇具浪漫的书生意气于是逐渐被冷峻的批判锋芒掩盖。

《文薮》就是这种政治热情主导下的产物。它首先从正面记录了自己的理想和作为,比较完整地构建起一套复古兴儒的治国纲领。再者它也不能不对令人失望的现实进行描述和批判。由于是行卷集,作者苦心经营笔墨,以使之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和主张。文体多样,但都渊源有自,一归于“古人之道”<sup>[11](文薮序)]</sup>。体裁本身的特点、春秋笔法的影响以其“求用”的观念,使得文辞上形成简约、斩截的特色。文学的追求在这里成了政治表达的手段,政治意识和热情的上扬,主宰着主体创作的整个风貌。一句话,与其说《文薮》是文学作品,还不如说它是政论更为合适些。

然而,这种昂扬向上的政治热情在皮日休中第后数年内发生逆转。《文薮》编定的第二年,他“榜末及第”<sup>[13](卷一)]</sup>。《南部新书》卷丙载:“大中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谓曰榜花”。萧涤非据此推断,皮氏就是叨惠于他的僻姓,以“榜花”题名的<sup>[11](附录三)]</sup>。这种形同儿戏的及第,不能不使满怀“兼济天下”理想而来的他心灰意

冷。对于颇为自负的他来说,这种“恩赐”只会损伤自尊。又,按唐制,进士及第后还得参加吏部铨选方可授官,铨选通例为“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证……”(《新唐书》卷四五)。而皮日休“貌不过中人”<sup>[11](卷九)]</sup>,为此还遭到礼部侍郎郑愚的戏弄<sup>[4](卷四九九)]</sup>。何况,“懿、僖以来,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贤人遁逃,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奋,天子块然,所与者唯佞悞庸奴”(《新唐书》卷一三三),可见正常的铨选制度已形同虚设,小人和庸奴正驾驶着国家机器奔向深渊。世道黑暗崎岖,皮氏想在京城谋得一官半职的愿望彻底落空。

皮氏怀着重重失望离开长安,途中经兵乱,辗转到了吴地。数年的奔波一事无成:他的建议无人问津,对时弊的抗议亦如重拳打在棉花堆里,费力而无效。理想受挫折翅,热望不过自作多情,皮氏政治情绪至此一落千丈。赏心悦目的江南秀景,正好抚慰失意的心灵,也为滋生隐士情怀提供了沃土。他在吟哦唱酬中优游岁月,在觥筹交错间麻醉自己。白居易又一次成为他精神的偶像,不过与未第之前继承白氏的现实主义精神截然不同,此时皮氏瓣香的却是乐天进退自如的生活态度了。前期的他虽亦有“语及名利,则如芒刺在背矣”<sup>[11](卷七)]</sup>的感叹,但这仅仅是偶生惆怅,所见不过是进取心的稍稍松懈。后期的他几乎忘怀天下事,所为只是在缓慢的时光中觅得俗世生活的乐趣,尽力把情感的皱褶抚得一平再平。

生活的根本改变让创作转向于无形中,政治热情的消退促使创作主体让位,由原来的政治自然抒写一变为隐士情怀的刻意表达。文字是心灵的折光,诗歌是缘情言志的理想工具,后期皮氏创作几乎与散文绝缘而专注于诗歌,这和他的心态是一致的。同时诗歌创作又反过来为他涵养“性情”服务,政治关怀的失落导致了心灵暂时的空白,于是作者以“纯粹”创作的热情取而代之。他简直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诗艺的探究上,以此自娱,亦以娱人。透彻地说,《松陵集》的文学追求是第一位的,这和《文薮》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意味深长的是,即使单从文学的角度看,《文薮》的价值也要高于《松陵集》,这可说是学界的共识。莫非文学创作也会出现“有心栽花花不活”的现象?答案是肯定的。纯粹为作诗而作诗,用力愈勤,离诗愈远,辩证法从来就是如此无情!“试看古人好诗,岂有无为而作者?无为而作者,必不是好诗”<sup>[15]</sup>,在专制社会中,知识阶层远谈不上独立,政治上的出

路几乎成为读书人的惯性追求,因此所谓“有为”“无为”某种意义上就是政治的代名词。绝大多数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政治密不可分,把政治对文学的戕害过分强调无疑是罔顾事实的。许多作家本身就是政治人物,“纯粹”的诗人也会因为“政治情结”而内心变得丰富复杂。政治情势的变化往往成为创作触发点,创作者在政治的浮沉变迁中令主体精神变得广阔深刻。政治常给作家以希望和失望,大喜大悲的考验,必然会使作家平添从未有过的体验。优秀的作家在政治的漩涡中总是对自我个性的保持有着天然的警惕,他对庸俗有着本能的排斥,境界因而自高。反之,消极的政治甚至对创作者自身的生存发展造成威胁,软弱的作者对政治避之惟恐不及,热情的消失直接导致才性压抑、胸怀萎缩,境界失之于大气<sup>[6]</sup>。“士不可无豪,文不可无英”<sup>[7]</sup>,而豪情英文总是有赖于政治热情的持续推动,皮日休前后创作差异的形成从正反两面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世道衰微,多以上大夫少奋发矫厉之志,但求和光入俗,期于寡祸而已,故节败才靡,皆由此出”<sup>[7]</sup>。这精当地概括了文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一个侧面,自然也可看做皮氏前后创作旨趣殊异的一个注脚。

## 二、性格气质的变化与风格差异的形成

生活的转折给创作主体带来的另一显著特征就是性格气质的变化。随着政治热情的消歇,皮日休开始冷静反省,似乎变得“成熟”起来。惧祸的心理使得他对外部世界小心翼翼,韬光养晦的人生态度将个性销蚀殆尽。渐趋平庸的性格气质必然给创作主体精神以直接的影响,造成前后期文风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差异的形成恰是性格气质逐渐内化的结果,换言之,皮日休正是通过创作实践来调整性格气质以养成理想的“性情”。两者互为表里,在不同的阶段彼此转化。

前期皮日休颇为自负,他不想掩饰激愤和傲诞。据《唐诗纪事》等记载,皮日休谒见归仁绍,因对方怠慢,乃作《咏龟诗》予以嘲讽,狂妄之举令人瞠目结舌。此种傲诞之举,不排除有刻意为之的可能,因为藉“狂”求名乃晚唐一时风尚。但最为根本的还应视此为性格使然。一个谨小慎微、局促委琐之人是很难想象会有这种标新立异式的“表演”冲动,何况皮氏狂傲性格得以特出的另一重要因素,正如前文所

论及,乃源于热情鼓舞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

登第是皮日休人生的最大转折之一。及第的原因令人啼笑皆非,热情和理想因此严重消蚀,这给他造成极大的刺激和伤害;但登第的结果又恰是梦寐以求的,它开启入仕之途,带来现实利益。是拒绝平庸,还是堕入世俗?阅尽沧桑,皮氏最终选择了后者。从桀骜不驯到“和光入俗”,性格的陡转经历了痛苦的过程。据《玉泉子》等记载:皮日休于省亲途中谒见刘允章,大宴之中“吐论纷扰,顿无礼敬”。刘氏大怒,“举席为之惧,日休雨涕而已”。这位张扬的“狂士”原本存有一丝平交王侯的豪气,但在受辱之后,再也不敢让个性和尊严以生命为代价向前迈一步。大庭广众之中叫板失败的尴尬给他的巨大震动可想而知,这成为其性格由刚转柔的契机。数年后,皮日休结束辗转投靠的生活,于咸通十年(公元869年)做了吴郡从事。此职虽属幕僚性质,依然让他有篱下之感,但毕竟是一份稳定的差事,皮氏格外珍惜。这时,跨过而立之年的他完婚,好友陆龟蒙还特地作诗相贺<sup>[8]</sup>。于自身而言,人生了却一桩大事,再也不必发出“处世既孤特,传家无承袭”<sup>[11](卷1)</sup>的慨叹,确实值得欣慰。政治热情逐渐消失所留下来的现实空间迅速被家庭生活所填充,加之人到中年日趋保守心态的浸染,皮氏性格于是慢慢软化直至于平和,洋溢青春热血的时代从此一去不返。

性格化刚成柔的过程,其实就是创作主体精神的演变史。生活深刻地改造着人的内心世界,人要在生活中寻找位置,就必然要不断调整精神状态以适应变动不居的外部现实,不管愿意与否,这有时是要以牺牲个性为代价的。皮氏和象征着自由的个性道别,毕竟出于无奈,为其如此,我们对皮氏后期表现出来的闲适而又略具感伤的情怀便多了一分体贴和宽容。但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个性放弃得越彻底,离文学的本质要求也将越疏远。

从更为宽广的角度考察,皮氏性格的变化当然和交往对象密切相关。交往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你来我往中,性格彼此渗透、影响,从而或丰富或削弱主体精神,在不同的环境下对创作促进或促退。毋庸讳言,皮氏后期性格的逐渐“柔化”,与他特定的交往对象和环境同样有着很大关系。在皮氏众多的友朋中,陆龟蒙无疑与他交往至深。仅以此为例略加剖析,即可管中窥豹。

皮陆友谊堪称典范,一部《松陵集》就是两人一心的生动记录。这种千古不磨的友谊首先建立在互相推慕的基础之上。陆龟蒙“性不喜与俗人交,虽诣

门不得见也”<sup>[8](卷十六)</sup>, 俨然以高士自许。但这位孤高之士却为面前唱和的诗友折腰, 他毫无保留地颂扬对方: “并包数公才”“气调真俊逸”<sup>[8](卷一)</sup>……仰慕之情, 溢于言表。仿佛报之以李, 皮日休对诗友的敬意更添三分, 他断言陆氏之诗可与温(庭筠)李(商隐)媲美, 执近代之牛耳庶几无愧<sup>[11](附录一)</sup>。他亦为知己“廉不受一芥”<sup>[11](附录一)</sup>的节操赞不绝口。皮陆这种相互推许之情源自内心, 确实是“真意孚洽, 不比后人之退有后言, 而面相标榜也”<sup>[9]</sup>。以近在身边的人为师友楷模, 再狂傲的人也会有“天外有天”的切实感受, 这种心理变化必然在性格上产生“摧刚为柔”的效果。皮陆之交, 颇具高人雅士情韵, 这种交往方式, 对双方性格的“雅化”乃至共臻平淡高远之境无疑有着促进作用。

另外, 他们在文学观念上的共鸣亦促使性格差异逐渐消泯而趋同, 在文字上则形成相似的风格。后期皮日休转诗笔于娱情, 此一旨趣自然与内敛性格及平和心态一致。对于这种转型, 陆龟蒙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陆氏诗论的内核在于“真”, 大力肯定诗歌养性的功能, 认为“诗者, 持也。谓持其性情, 使不暴去”<sup>[8](卷十一)</sup>。此类观点为表现闲适情调和取材生活化大开方便之门。在陆氏心目中, 平平淡淡固然真, 怪怪奇奇又何尝不真! “怪”是一种鲜为人注意的客观存在, 表现它与求“真”原则并不龃龉。为此他不惜矫枉过正, 主张“不怪不能图其真”<sup>[8](卷十八)</sup>。显然, 《松陵集》中大量怪涩险奥意象的出现相当程度上是这种理论指导下的产物。陆氏的看法皮日休十分欣赏。由于过分认同陆氏文学观, 皮氏更生出生是昨非之感。前期创作中充满忧患意识

的真性情不复再现, 后期敛抑英气的“性情”却孜孜以求。“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旦视娱情养性为求真之途, 就意识不到南辕北辙的危险了。性格的平易化直接造成精神主体的贫弱, 失去了广阔现实生活的激荡, 创作实践便只能限定在为作诗而作诗的层面上。心源无活水, 诗口必枯竭, 所以皮氏感叹道: “由古至律, 由律至杂, 诗之道尽乎此”<sup>[11](附录一)</sup>。情投意合的皮陆, 以诗为纽带, 既相互推慕, 又自我炫耀, 因此创作中免不了日锻月炼, 甚至斗险出奇, 这直接导致了诗歌功能从言志到娱情的转型。皮日休还以为: “词之作固不能独善, 必须人以成之”<sup>[11](附录一)</sup>, 更为作诗“游戏化”提供说词。平心而论, 皮陆之交对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是有促退作用的, 皮日休自不必说, 陆龟蒙又何尝不是如此? 两人分别后, 陆氏开始了以小品文为主体的散文创作, 取得了较诗歌高得多的成就, 这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

#### 参考文献:

- [1] 皮日休. 皮子文藪[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2] 鲁迅. 鲁迅全集(卷5)[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 [3] 孙光宪. 北梦琐言[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4] 李肇. 太平广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5] 薛雪. 一瓢诗话[A]. 原诗·一瓢诗话·说诗语合本[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96.
- [6] 余恕诚. 唐诗风貌[M].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 146-149.
- [7] 周亮工. 尺牍新钞[M]. 上海: 上海杂志公司本.
- [8] 陆龟蒙. 甫里先生文集(卷九)[A]. 四部丛刊初编本[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9.
- [9] 余成教. 石园诗话[A]. 清诗话续编[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1776.

## Changes in life experience and transformation in writing —Expounding a reason why writing style has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Pirixiu's earlier and later stages

PENG Ting-song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content, form, style and achievement between Pirixiu's earlier and later writings. His writing process is almost consistent with his life experience, especially his great changes in life style. Changes in his experience caused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political enthusiasm and transformation in disposition. The writer's state of mind echoed the changes from afar. The mutual action was the key cause that resulted in differences between Pirixiu's earlier and later writings.

**Key words:** Pirixiu changes in life; transformation in writing; political enthusiasm; disposition